



历史课的价值、灵魂、精神与魅力

孔繁刚，上海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先后担任过全国历史教研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讲座教授。现任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学会理事、华东师大教育系科教合作中心学科教师培训项目指导专家。连续参加上海市历史



学科高中教材三个版本的编写；曾经参与国家教委组织的教学指导用书的编写。先后在国内外国省市级以上的教育教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教案、教学实录三十余篇；在全国历史教研会年会及国外相关学术会议上多次作主题发言。

演讲人：孔繁刚

演讲题目：历史课的价值、灵魂、精神与魅力

演讲时间：2011年12月7日星期三下午3:00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第三教学楼206室

主持人：王正瀚

整理者：蔡 一 王正瀚

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请来了上海中学历史特级教师，也是全国资深的历史特级教师孔繁刚老师来给我们做中学历史教育的专题讲座。孔老师是我

们的杰出校友。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很宝贵，在座有一些刚刚经历了中学实习的大四同学，还有一些研究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摘要：**历史课的价值在于真实，历史课的灵魂在于思考，历史课的精神在于情感，历史课的魅力在于细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教学体验向同学们生动形象地展现一个历史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把握主线，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如何在课堂上陶冶学生的品性与情操。

同学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回到母校，而且来到这里我总是感到格外亲切。半个世纪以前，我就是在这里读书的；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的已经病故了，但有的还健在，比如说郭绪印老师，我们现在还经常见面。

最近网上有两个命题讨论得比较热烈，其中一个讲到西化的问题。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西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同学们可以自己看一看，你的发型是中国古代的吗？基本上是西方的。你的眼镜、服饰基本上也都是西方的。马路上的交通工具，有哪一样是中国古代留下的？基本上也都是西方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五十年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老师给我讲过这个事情。上世界近现代史时，老师就讲西化是不可抗拒的。这位老师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朱延辉老师，他一生述而不作，几乎没有文章留下，但是他参加了最早的1936年版的《辞海》编写。现在我在讲史，大家看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国门，可以说三十多年来变化最大的就是开放。当初我们最早走出国门的时候，被西方所吸引的是电视机、牛仔裤这类商品。要是有一个亲戚带个彩色电视机回来，那真是兴高采烈，以后每个晚上都恨不得在电视机前度过。这是当时商品进入国门，其后当我们再度跨出国门的时候，被西方吸引的是什么？是城市建设，西方的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这些后来就在中国兴起了。今天我们到欧美旅游，则是被西方的环境、绿化、秩序所吸引。现在我们再想想，上海哪一点不如西方啊？其实说到底，是人的素质问题。有一个中国警察到日本旅游，从日本回来之后，写了三件小事，他以一个警察的眼光去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一件事，在上海一个热闹的商业区，如果一个钱包落在了柜台上，你转一个身回来想

要再找到是很困难的。但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我去京都清水寺时忘记了一个保暖杯在那，等我兜一圈回来，这个保暖杯还在原地。第二件事，他在日本的麦当劳发现，很多人是把包放在座位上然后去买东西。而在中国，不仅包要随身携带，还要被反复提醒，包要放在身体的前面。这就说明日本的治安很好。第三件事，他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看见有人在示威，但是示威的人就在划定的区域内喊口号、拉标语，警察也就在区域外走走、看看，大家相安无事。从这个警察的感受中可以看出，目前来说中国的开放是不可抗拒的。邓小平在 1979 年访问美国时说过：“我看凡是向美国学习的国家都富强起来了。”

今天能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亲切。我离开讲台已经十年了，今天这节课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最后一课。我是 2002 年到退休年龄的，后来延长了四年，延至 2006 年退休，距现在也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讲的内容可能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接近课堂。虽然我在课堂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更加年轻的一代已经超过我们这一代了。这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理念的不同、现代教学手段的进步，比如摄像机、PPT，对于我来说就不太熟悉了，也不太懂操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如以前的话，不是不如我们这一代人，而是不如解放前。我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教育部副部长柳斌曾经说过：“**理科同国外比，文科同解放前比。**”上海师大历史系最著名的教师都是解放前的中学历史教师。解放后的，我们能够和他们相比吗？在教育方面，现在可能还不如民国时期，特别是文科；有些地方民国时期不行的，可能现在更不行。我这样说，可能让在座各位压力倍增。在我进入上海师大的时候，受到的思想教育主要是让我们立志于基础教育，至于专业方面的要求就淡化、弱化了。在上海的基层教育战线上，上海师大确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复旦和华东师大。但是现在我们上海师大毕业生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就业方面。来敲上海中学门的很多都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打底的也是华东师大的硕士研究生，还有复旦的研究生，甚至还有北大的。其实上海师大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的教学比较严谨。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严谨，这里面也有很多漏洞。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上海师大读书，四五年前毕业后，我把他介绍到曹杨二中，曹杨二中是普陀区的头牌高中。他在那里压力非常

大，第一次考核考了末位，曹杨二中实行末位淘汰制，他就没书教了。后来他考上了华东师大冷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这个冷战研究中心在全国可是数一数二的。他说，他在上海师大学习的时候学校什么都给了他，唯独历史没有给他。我总觉得解放后在基础教育上，我们这个学科知识的教育太差了。当学生踏进上海师大，得到的教育就是一辈子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自20世纪60年代教改之后，历史课被大量削减，考查历史教师的标准不是学科知识而是家庭出身、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等。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文科教学不如解放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评价一个历史教师的标准就是达标，教初中的要求大专学历，教高中的要求本科学历。当时相当多的老师并未能达到这一标准，所以这些老师一方面当老师，一方面当学生以弥补学历上的不足。到了90年代，对于老师和校长来说，标准就是分数，分数就是命根子。所以说，现在中学历史老师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想包括我们这一代刚退下来的一批老师在内，问题便是学科专业知识的浅薄与僵化。

一、个人成长之路

历史课的价值来自于它的真实，历史课的灵魂来自于它的思考，历史课的精神来自于它的情感，历史课的魅力来自于它的细节。下面先讲一下我的成长道路，因为对于一个中学历史教师而言，也可以得到历史的价值。我认为，我们历史教师随着学生的成长，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存在于学生的心目中，凝结在学生的成长道路上。2008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办了一个“走进名师”栏目，邀请我写一篇文章，盛情难却，我就勉为其难写了一篇，题目叫《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天时，意指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教学的价值在于教真实的历史，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人为了挖掘历史的真相而付出了生命。过去，我们历史教学有四本参考书，苏联两本，中国两本。苏联的一本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本是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中国的一本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另一本是胡乔木的《中共三十年》。我们整个历史教学的框架没有跳出这四本书。所以说，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是要进行重新编写的。国家前几年搞了一个“夏商周

断代工程”，苏智良教授就说还不如把这些钱投入到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当中。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调查越来越困难。日本的靖国神社、美国的一战纪念碑，上面的死难者都有名有姓、有据可查，而我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名有姓的遇难者至今大概才五位数。历史的真实性想要调查清楚很难。中学历史教学属于国民教育，它有中央制定的教学纲要，教师也只能在这一范围内进行教学。虽然当前社会矛盾突出，但是我们是不赞成“茉莉花革命”的，我们希望通过体制内部的改革来解决问题。历史的真实性对于历史教学来说是第一位的。

其实中国古代史也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比如司南是假的，地动仪是假的。同学们进入大学以后，可能会发现中学历史老师教的历史有不少是失真的。但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以后确实给我们历史老师带来了很大的自由和发挥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最解放的是经济学。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我们总是说西方资本主义是搞垄断的，但是他们很早就出台了《反垄断法》。相比其他学术领域，经济学还是比较开放的，我们历史学科应该说还是相当进步的。杨奎松的书、高华的书、沈志华的书都是经得起时代变迁检验的，因为其中的结论都是有材料作为证据的。有一次萧功秦教授到烟台开会时遇到我，问道：“你们中学历史书怎么没有1957年到1978年的历史？”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学的历史课堂还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单位，而中学是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在对待主流意识形态与历史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关系上要把握好尺度。

第二个因素，地利。我刚刚从上海师大毕业的时候去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我家住在卢湾区，我是向明中学毕业的，我当然希望回到向明中学教书。但事与愿违，我被分配到杨浦区，那时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杨浦区，对于当时的“大杨浦”根本就没有概念。去了后我被要求教初一政治，后来因为我是共青团员，政治素质比较好，所以被充实到政治素质相对较差的英语学科组去进行教学。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完全就是“哑巴英语”，只能做一些阅读，听说能力非常差，直到现在都很一般。我只好晚上到复旦大学读夜大进修英语。在1978年之前我一直是英语老师，所以现在有些当时的学生看到我都说我是他们的英语启蒙老师。直到1979年进入上

海中学后，我才回到历史学科。当时我又教历史，又教政治。上海中学确实是个好学校，语文英语都是使用公共教案，就是所有老师用同一份教案。但是教历史的就我一个人，我只好一个人备教案，我做了整整两年。上海中学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环境相对宽松，从不检查老师的教案。后来有一次副校长问我，一星期要上二十多节课，有没有时间备课？我就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备课，有的不备课。我觉得上海中学这种宽松的环境就是地利。

最后一个因素是人和，人和造就了我。我刚到上海中学不久，碰到了一个机遇。我遇到了一个苏州老乡，他后来成了教育学院的第一代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宋史专家。他对我非常看重，把我吸收进来编写国家教委的教学指导用书，把我吸收进上海市历史学会，又让我参加了一期课改教材的编写。这些大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教学工作中的确有许多人帮助过我，正是这些人帮我构建了这个平台，让我登上了历史教学的高峰。

所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如果现在还要我复制这样一个条件，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当年我录取在上海师大，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的时候，我也有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当我离开教学岗位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当年所追求的目标。历史特级教师只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职称。现在中学教师也要评正高级职称，我总觉得我的成就还远远达不到大学教授的水平。

我现在是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办了一个“名教授与准名师的对话”活动。我每年都会请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的教授与中学一线的教师进行零距离的对话。第一次我们请了上海师大的叶叔宗教授、复旦大学的沈渭滨教授、华东师大的王家范教授等，后来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也多次举办过类似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受到了一线中学教师的热烈欢迎，大家为在中学也能搞出这样高规格的学术活动而振奋。退休后，我参加了华东师大教育系科教合作中心主办的一个“聚焦课堂”项目，经常带着几个青年教师到全国各地给当地教师评课。2004年，我从日本探亲回来，收到了人民教育社的一份杂志，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名师人生”。这个栏目已经搞了几十期了，上面基本上都是介绍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班主任和校长，

没有小学科的教师，那个编辑便想请一些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的教师去充实这一栏目。他们找到了我，于是我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教师的价值存在于学生的心目中》。

在我离开讲台的时候，我的学生为我举办了一个活动，叫“最后一堂课”。那些已经毕业二十多年的学生，都回到母校和2006届高一学生一起听了我的最后一堂课。上的是什么呢？EMPP。因为我参加过多次教材编写，高三教材现代化的道路中讲到的英国部分便是由我编写的。我和上海中学国际部的老师也进行过交流，他们开始不太理解，后来我进行了一番解释。EMPP是英国对于人类现代社会的贡献。E就是English（英语），英语作为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为世界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M就是Machine（机器），英国的机器制造业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2个P分别是Parliament（议会）和Party（政党），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端就在英国。我上这节课的时候是2006年6月底，那时正值德国世界杯，多少人如痴如醉地熬夜看球。其实这项当今世界第一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在英国。当我上完最后一堂课时，我感到我取得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当年设定的目标。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学生认为我讲的历史比较真实，即使在离校多年后，还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

二、历史课的灵魂、精神与魅力

历史课的灵魂在于它的思考。我们以前一直把历史课当成一种说教来处理，其实历史课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现在搞二期课改，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从哪里来？中国人一直在讲创新，其实我们可以翻开国外的书，在创新前面就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要求。最近我们到一所中学去上了一堂课《从蒸汽机到互联网》。这一单元分为三堂课，第一讲是科学家，比如伽利略、牛顿；第二讲是达尔文；第三讲是从蒸汽机到互联网。其实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第一讲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第二讲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第三讲则是人类改造世界、造福自己。比如讲瓦特，瓦特之所以能成为瓦特就是因为有一种创新精神在推动，有一种怀疑和质疑的精神。所

以，我认为历史课的灵魂就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比方说，在讲古代数学的时候，我们会讲九章算术，讲九九乘法表，讲勾三股四弦五，但其实这三个都是有局限性的。勾三股四弦五少了一根弦，是什么呢？推理。但是别人创造了什么？ $a^2 + b^2 = c^2$ 。九九乘法表其实是经验的堆积，而九章算术仅限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但实际上数学大量的题目不是应用，而是思维的训练。

历史则不同，比方讲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因为它需要市场，如果不占领中国这样的市场的话，它的资本主义怎么走向世界？不走向世界怎么实现现代化？再比方说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拿到的“查理二世国王奖”，查理二世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一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二反攻倒算，三鞭尸。以这样一个人物命名的奖，温总理怎么会去拿呢？其实，这个奖的全称是“文明与进步奖”。查理二世创建了皇家学会，而皇家学会中诞生了一位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他还创建了格林威治天文台。因此，我们不能只去看他政治上的表现，这样会缺乏对一位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

同样，我到美国旅游时一个美国导游说，在美国对于一个人的历史评价不是像中国一样盖棺定论，他的评价要到五十年之后才能形成，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历史上可以称为杰出的总统的就只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那么有没有第五个呢？请同学们注意，2013年可能就会诞生一位与前面四位齐名的第五位杰出的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遇刺身亡）。那么肯尼迪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美争霸，他和赫鲁晓夫较劲。但是他领导美国社会进行了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

还有，我们在教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应该讲为什么先要让香港、澳门回归，然后再解决台湾问题。因为香港有一个99年的租借条约，而且香港的回归可以洗刷百年的耻辱。我们知道1984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谈，其实领导人会谈外交部都是要拟好提纲的。但有两个人是不需要提纲的，一是毛泽东，二是周恩来，三是邓小平。有一位老师在讲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邓小平已经逝世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是动人的却又是真实的情感。

为什么说澳门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台湾问题最难解决？我们一讲到台湾

就是培养愤青，只知道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口号。历史课不是政治课，政治是尊重需要，历史要尊重史实。外蒙古被割让出去了，毛泽东到莫斯科找斯大林要，斯大林说那把外蒙和内蒙并一起来谈，毛泽东一听，怕到时候连内蒙都保不住，就不谈了。台湾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第一，这是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外族敌人造成的。第二，背后有外国势力的干涉，美国、日本都喜欢插手。第三，我们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失误。1956年时其实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周恩来已经在仰光回答记者，如果蒋介石回来，至少给个比部长高的职位，结果1957年开始反右，1958年炮打金门，这个机会就错过了。1965年机会又来了，我们已经谈到了让蒋经国留在台湾当省长，蒋介石可以回大陆定居的程度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机会又错过了。再后来蒋经国死了，如果他不死，再多活两年，形势很有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解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要把香港、澳门搞好，让台湾看到“一国两制”是可行的。第二，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从以上几点来看，我们历史的意义就是改革需要反思，前进需要回顾。世界史会长潘光说过，“好多问题其实回到历史就能解决”，“以史为鉴”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课的精神在于它的情感。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美国南北战争，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强调它的一点是为了推翻黑奴制度而斗争，但林肯上台后没有立即废除黑奴制，当时我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到了90年代我们理解他了，因为他是总统，他要为祖国的统一考虑，避免国家因此而形成分裂的局面。到了今天，我们怎么讲南北战争？去看看葛底斯堡演讲。一共两百多个单词，有没有讲到统一，讲推翻奴隶制？没有！有的是自由平等，最后提出要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同样一个内容，站在不同角度回过头去看，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

同样的，在讲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时候，我让一个也是上海师大历史系毕业的老师特地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有些老师不理解，这个和课程内容有什么联系啊？我就说，这段不能减，后来这堂课讲完后效果非常好。十二月党人为什么造反？穷人造反是因为没吃没穿，而十二月党人是对自己特权利益的不满。我们再讲讲民国，20世纪20年代的

民国青年都要去广州，去北伐救国。30年代时好多人出国，到国外去寻找科学救国道路。到抗日战争的时候，奔赴延安、奔赴重庆都是抗日救国。这些青年人追求的就是一种理念，所以说我们历史课要有一种从情感到精神的追求与铸造。

历史课的魅力在于它的细节。其实我觉得上海师大主编的那本文明史的教材还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夭折了。有些人说想要回到20世纪50年代，但我绝对不会要求回到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培养的不是人，是工具，是螺丝钉。比如以前说到夫妻的问题，我们结婚的目的是什么？生儿育女。而人家结婚是为了对爱的追求。

美国的档案馆里面原原本本放着当时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本，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档案馆去看。后来一次档案馆工作人员把这个原本拿出来进行维护保养，在保护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用仪器检测出，在公民这个单词的背后好像有修改的痕迹。经过仪器测定，原来的单词是“臣民”。这一改动创造了现代化政治“公民”的概念。再比如说一厘米的智慧，20世纪60年代东德修建柏林墙，但还是挡不住人们往西柏林跑，有一个青年在翻墙的时候被一个人民军战士击毙了。后来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那个战士受到审判，律师为他辩护说这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法官说：“执行命令没有错，你难道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吗？难道你就没有道德的底线吗？”我觉得这种精神应该灌输到课堂中，怎样在特殊情况下守住道德底线。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为止了。我觉得我们历史老师在建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认为历史课必须有一个立意，即学好中国历史了解改革的必要性，学好世界历史清晰改革的方向。如果我们能让学生从喜爱历史到喜欢读历史书，从喜欢读历史书到喜欢读经典著作，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素养就大不一样了。

我想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后虽然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再聆听孔老师上历史课了，但是大家肯定能够通过刚才饱含激情的讲座，领略到当年孔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更为重要的是，同学们回去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怎么

成为一个善于思考的历史老师。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孔老师！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提问。

学生甲：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课上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学生？

孔老师：这还是一个主线的问题。据说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吸收意见时，把葛剑雄教授找去了，葛教授就提了一个意见，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两个“大”字去掉。但是后来也没被接受。其实在课堂上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戊戌变法，可以比较在当时对变法是怎么认识的，到民国时期是怎么认识的，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怎么认识的，到了今天又是怎么认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相比过去，环境宽松多了，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与借鉴。萧功秦教授说过：“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因为太过于超前。”客观地叙述历史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们还是要守住道德底线，尽量把主流意识与学术前沿的成果结合起来。

学生乙：如何在课堂上对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孔老师：我看教学论文的时候，看到类似“走出传统，走向创新”这种话的时候一般只给C甚至D。你走出什么传统？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民国以来的传统？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尊重传统，还要回到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的、写的、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历史老师还是要有一颗史学的良心，**或者就像虞云国教授所说的，**历史课在学生面前既要让他们感到温情，又要让他们感到敬畏。**

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要奔赴教学岗位，但是历史学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从事历史教学也可以爱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科什么人都能听得懂，不像数学、物理其他学科。所以我觉得，**历史课有时候也要讲得有点深度，让人家觉得历史也是一门科学。**现在**历史进课堂有三个层次，一是把课本整理以后进课堂，这是低层次的，但这符合应试的需要；二是改造课本进课堂；最高层次是创造以后进课堂。**可以说目前为止上海上得最好的一堂历史课就是晋元中学副校长，即现在的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周飞老师上的一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课，他把胡适作为一条主线讲新文化运动。要创造以

后进课堂，这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

学生丙：创造以后进课堂是要以教材为基础的，那如何把握创新的尺度呢？

孔老师：最重要的是讲过程。周飞老师就是以胡适的日记为线索来讲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青年杂志》最初每周只发行几千册，那么这场运动是怎么在全国推广的呢？周老师认为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蔡元培把陈独秀调到北方，《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高地。二是白话文运动。周老师不是从我们习惯的角度讲的，第一《新青年》，第二科学民主，第三白话文运动；他是通过胡适这个人来讲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历史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学生讲过程。